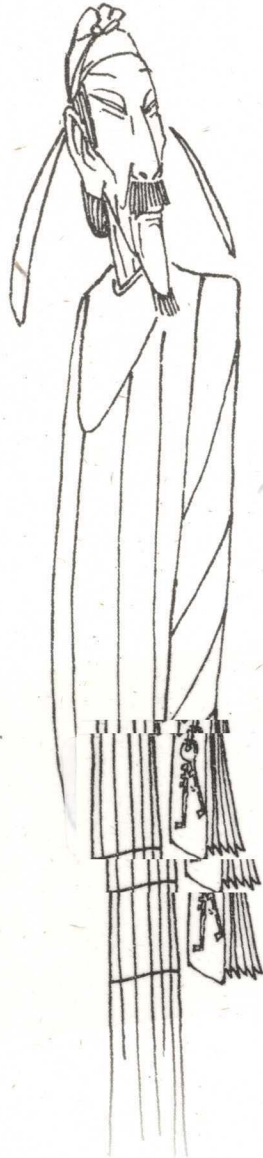




程輅光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詩聖杜甫



杜甫詩聖

程輜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圣杜甫/程韬光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765-277-9

I. ①诗… II. ①程…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15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安阳市泰亨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40.25
总字数 556 000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55.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一：文学解读的魅力

王立群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从活生生的人物原型到读者、观众心中的历史人物，大都要经过四个阶段：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历史记录中的人物，后世解读的人物，读者接受的人物。所以，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四种形象：真实的形象，记录的形象，解读的形象，接受的形象。

真实的历史人物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唯一性，二是不可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一旦逝去，永远不可能再生，不可能重复。因此，被今人挂在口头上的“再现历史”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目标。

如果这个人物被历史学家记载下来，记载之时，史学家所能得到的有关这位历史人物的书面或口头的文献往往具有某种偶然性，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史学家最需要的、最详尽的、最客观的文献，即使史学家得到的是非常丰富、非常客观的史料，史学家在记录历史人物时也必须有所取舍而不可能将所有材料全部堆砌于传记之中。因此，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到历史文献记录的人物，肯定经过了后人的取舍，有后人的补充和想象，有强化或弱化，有神化或丑化，有史学家个人的爱憎、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加工！经过了这道最初的加工，历史文献中记录的人物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形，已经和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有了区别，有些甚至有了很大区别。即使是诗人自己撰写的诗篇，也有刻意与率性之别，掩盖与据实之分。

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人物到了今天,有些经过了数千年,有些经过了几百年,今人在解读这些历史人物时,又写出了数量众多的人物传记,这些被今人解读的历史人物,形象迥然不同。同样是一个孔子,有人解读成“丧家狗”,有人解读成和谐社会的构建者。同样一个秦始皇,根据同一本司马迁的《史记》,有人解读成仁君,有人解读成暴君。不但有学者在解读历史人物,每一个时代的当权者也在对历史人物进行符合自己政治需要的解读。这种解读受时代的影响,受解读者个人好恶的影响,受解读者所占有历史文献多寡的影响,受解读时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更受史学家记录的影响,受解读者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影响,解读后的历史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会有更大的区别。解读历史大都会走向两个极端:神化与丑化。神化是弱化或剔除了历史人物平庸的一面,增补了历史人物不凡的一面;丑化则与之相反。

读者呢?读者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史学家解读的历史,他们也在选择是否接受解读者的解读。无论你是史学大师还是文学大家,也无论你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写手,无论你的书畅销还是不畅销,读者对自己关注的历史人物,并不会完全跟着解读者的笔在走,他们也有自己或赞成或反对的看法。总之,读者不是好糊弄的。

作为历史上真实的杜甫,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逝去,我们今天看到的杜甫只有作为历史文献的《新唐书》、《旧唐书》中记载的杜甫,众多杜甫诗集中映现的杜甫。但是,这些记载中记录的杜甫已经和真实的杜甫有了距离。今天,我们再根据历史文献和杜甫诗篇再现杜甫,只能再现一位我们心中的杜甫。

让今天的读者认识杜甫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历史的解读,一是文学的解读。历史的解读是根据文献、诗篇,以理性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大诗人杜甫。文学的解读是根据文献、诗篇的记载,以感性的语言叙述一个传奇的故事,塑造一个大诗人杜甫。虽然二者的解读方式大相径庭,但是,二者的解读都是不可替代的。

比如《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曹操,哪个更真实?当然是《三国志》中的曹操。但要问哪个影响更大,无疑是《三国演义》。所以,今天中国老百姓心中的曹操其实不是《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而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曹操。可见,文学解读的魅力非常之大。当然,这是指顶级的文学解读而言。能够像《三国演义》一样以文学创作解读一代历史、解读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的,非常不易。

韬光先生的这部大作正是以文学创作解读杜甫的成功之作,他使用的语言也是文言(这需要功力),这又和《三国演义》不谋而合。

韬光先生的《诗圣杜甫》和《三国演义》又有很大区别。《三国演义》是在前人累世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成书,而此作纯属韬光先生独立撰写。更重要的是,韬光先生此作重在挖掘诗人的精神世界、人生状态,努力再现杜甫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诗性人生。书中大量引用杜甫的诗篇,《丽人行》、《哀江头》、《春望》、《三吏》、《三别》、《秦州杂诗》、《同谷七歌》等杜诗融入传记小说之中,在环环相扣的情节中让我们领略了一位心系天下的诗圣杜甫、才情杜甫。这是一种个性,更是一种创造。它再一次证明了文学解读的魅力之巨大!

2010年3月26日

于河南大学

序二：毁灭、见证与救赎

耿占春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影响深远。然而，长期以来，这个关注国运与民生的诗人一直滞留在由极少数人组成的圈子里被研究、被注释、被批评，很少有人让他回到大众中来。即使进入“五四”以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1927年），冯至的《杜甫传》（1952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1年），如此等等，都是把杜甫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曾把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最早有意改变这种状况的应该是闻一多。从1925年开始，他就以“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为杜甫画像，并于1928年发表了部分成果，即《杜甫》。在该文的引言中，闻一多写道：“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么样的悲恸，怎么样的心焦！”因此，该文在注重史实的基础上致力于摹写这些“茫然”，所使用的是充满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写完。1962年，冯至利用为杜甫作传的相关材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白发生黑丝》，用文学语言描述了杜甫与苏涣交往的故事。这篇小说曾作

为附录出现在《杜甫传》里,后来考虑到体例不合,作者又把它删去了。用冯至的话说,“传记尊重事实,小说依靠想象”,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和笔法。从闻一多和冯至的创作中不难看出将杜甫“文学化”的难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韬光先生出场了。这个文学挚爱者不畏艰难,秉着对大唐诗人的无限敬意,立志将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变成小说的主人公,并尽可能在历史语境和日常生活的氛围里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诗人形象。

与前人相比,《诗圣杜甫》这部著作则突出体现了对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化”叙事的魅力。闻一多和冯至都谈到过杜甫史料的贫乏,闻一多的《杜甫》篇幅较短可能与此有关;冯至在《杜甫传》的“前记”里说:“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由此可见《杜甫传》对历史的忠实程度。而《诗圣杜甫》的突破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它既忠实于历史,尊重事实,又依靠想象,在不违背史实的情况下加以虚构。因此,韬光先生的《诗圣杜甫》既是关于杜甫的文学传记,又是一部包含着虚构因素的历史小说,意义不言而喻。

文学叙事意味着一种被阅读活动与书写传统所授权的想象与虚构的权威,只有借助文学的想象力,才能对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对业已消逝的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认知。对于历史小说而言,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历史人物的“文学化”程度不够,使作品成为历史与虚构的大杂烩。因此,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将历史充分“文学化”,或者说使文学完全统贯历史,将历史的真实纳入一个人的命运,他与外界的接触,他的需求和与他人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心感受当中,从而使历史事件无一不在文学的框架和虚构的氛围里展开。从总体上看,《诗圣杜甫》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用文学想象力承载历史真实,用个人的生活史容纳历史与时代全景。全书以杜甫的出生、漫游、求仕、流亡和死亡为线索,将他一生的踪迹和时代遭遇融为一体,突

出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个人的命运明显受制于时代,个人的行动(包括言论和创作)又会对时代施加微弱的影响,从而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形成互动关系。而在杜甫,这种关系又是个人与社会、诗歌与权力、行动与感受、诗与史之间多重互动关系的一个呈现。

与《诗圣杜甫》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相应,作家在著述中倾向于追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书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事件、地方掌故、宗教民俗、医疗饮食、书画音乐等方面的知识以及诗歌作品。《诗圣杜甫》有宏大叙事,也有对微末之事的叙述。如有关于“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社会及其边境战况,也有关于个人生活的具体境遇,日常的细小之事。小到对日常事物、言谈举止、宴饮与食物的细致描写。在宏大叙事的参照之下是小叙事的魅力。这些方面有杜甫与姑母打枣子时关于枣子的食用价值的谈论,也有如杜甫江南漫游时所聆听的鉴真论医道那样极其精辟的专业洞察。《诗圣杜甫》的百科全书性质实属作者广阔修养的自然流露。

在《诗圣杜甫》中,无论是宏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的叙事,大都被有效地文学化了,尽管有些环节文学化的程度不够充分,特别是某些历史事件与诗歌作品这两个方面。在作品中,历史事件或出自人物的亲历,或出自相关人物的转述,特别是书中对“安史之乱”前后杜甫本人遭遇的描写,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有时借助人物的目光和内心世界的主观叙述,有时则是作者使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但也有个别事件明显只是出自作者本人的叙述,没有被充分文学化,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考据的学术性的叙事方式。第二十六章杜甫回味一路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家小所在的鄜州羌村历程,作者致力于描写诗人“从君王身边走向人民中间,杜甫如同从山顶走到谷底”。作家的叙述则大胆使用了学术性的话语: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忧端齐终南,颍洞不可

掇”的杜甫，就着一豆灯光，怀揣着自己无法解决、无法回避、无力回答的矛盾纠结，凝聚着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肝肠如火，涕泪横流”，以“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方式，以《北征》为题，痛定思痛，写下“上关庙谟，下具家乘”的“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具一代兴亡，与《风》、《雅》、《颂》相表里”的政治陈情表……

呜呼！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杜甫此篇结合时事，加入议论，冲破旧诗藩篱，通诗与散文合一，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一开后人以“笔”代“文”者之先声。

这样一些叙事话语出现在小说中是比较罕见的，但却为理解杜甫这样一位人物提供了一个必需的智性层面。与之同时，《诗圣杜甫》也涉及杜甫诗歌的“文学化”问题。杜诗既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也是他内心感情的凝结，是诗人生活遭际的记录。当作者把杜甫的诗歌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展示出来时，他赋予杜甫诗歌一个解读的语境，让我们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及杜甫个人的经验语境中解读这些诗歌。这样一种将诗歌嵌入叙事的做法具有文学叙事上的独创性，不仅它本身就属于文学，而且能起到与小说互相激发的感人效果。而且，作者有时在引用诗歌后往往加以进一步解释或评点，甚至引用古人的相关评语，似乎游离或暂时停滞了小说的叙事进度。从表面来看，这种非文学化倾向是作者受了杜甫诗歌学术研究传统的影响；从其内在性来说，这也和小说叙事的人称有关，作者本人并非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这时他却不自觉地扮演成了一个注解者和一个评说者，强行进入小说当中，致使作品出现了一种学术品格。与此相应的是，尽管这部作品全书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但由于作者对杜甫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有些地方直接书写了杜甫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它部分地获得了复合效果。也就是说，本书的人称可以视为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融合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充分

理解主人公的努力。

与作者已经出版的《太白醉剑》一样,《诗圣杜甫》使用的依然是读者可以接受的“浅近文言”,并且采用了章回体形式,全书显得古风浓郁,笔力深厚。推行白话文将近百年的今天,重新运用文言写作并非复古,而是一种相当现代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或恢复了当代读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感。事实上,作者用文言写作的初衷并不在文体意识,而是因为他写的是古代诗人,用文言更能显示话语的真实性。同时,为了与主人公的话语以及书中的诗歌保持语境与风格的一致,作者的叙述也采用了浅近文言,不少语句短小精悍,甚至连续出现一些四字句,使作品看上去显得异常凝练。

历史人物的“文学化”是《诗圣杜甫》的成功之处,而这部小说的学术品质则是它的一个实验性特点。《诗圣杜甫》作为第一部详尽描写杜甫生平与杜甫诗歌写作全部历程的历史小说,作者致力于写出诗人杜甫的实体感与复杂性,写出其诗歌精神的深度,并把杜甫放在一个时代从繁盛转向严重的社会灾难的进程中加以塑造,写出了杜甫对国君、对权贵、对贤臣、对民众、对叛军、对异族、对亲友、对自身以及对族人的复杂态度。这有助于使一个全面而真实的杜甫形象走向大众,从而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杜甫的伟大人格,领略杜诗的深远魅力。

《诗圣杜甫》融历史材料与文学想象力于一体,它所呈现的不再是教科书里的杜甫,也不再单纯是学者眼中的杜甫,而是文学家笔下的杜甫。这个形象初看之下并不伟大,相反,他显得那样令人心酸。他的仕途被奸佞所误,令人叹服的才能被“野无遗贤”的阿谀之词所遮蔽;虽然杜甫怀抱着有些迂腐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他长期被排斥于官府之外,他的政治理想很难在他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寻找到实践的空间。即使介入幕府生涯之后,他也因性情的耿介与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而无法适应官场的现实,遭到贬职甚至自身难保。在第三十二章中,作者写到严武治蜀期间曾邀杜甫进入幕府,起初杜甫

并不情愿,他觉得做官与自己的个性不符;事实上任职之后,他也没有多大作为,而且时常感到来自同僚的排挤和压力。作者在描写了杜甫与严武的亲密关系之时也揭示了他们之间的隔膜和冲突。在第三十六章中,甚至出现了杜甫险些被严武杀害的情节。与学术著作相比,文学作品往往能更全面地呈现出隐秘的真实。

除了杜甫生涯中的流亡、避难,以及作为杜甫生活常态的疾病与饥饿之外,韬光先生在描写杜甫短暂的幕府生活时,也没有忘记杜甫在人格上所饱尝的屈辱与痛苦。那些使君、县令之流只知杜甫通诗文、通药理,用到他时只不过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并无对杜甫的理解与情谊。杜甫常常在他们设宴迎送的时候陪居末座,不得不写下陪宴和送别的诗,感受着伤心与侮辱。他不会如同长安十年时期那样自称“贱子”,在诗题中使“陪”字如此不堪地醒目。杜甫不是《太白醉剑》中李白那种“仰天大笑”的形象,他小心谨慎地应付着,末座陪酒赋诗,只为自身和家人免于冻馁,或获得些许资费,对这位心怀天下苍生的诗人来说,其中含有无限的辛酸。如韬光先生在第三十四章中所写:“想起自己于梓州为得活命,虚意应酬,违心迎合此地官吏,心中无限辛酸,悲沁骨髓。”这也是第三十四章所引杜甫在《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一诗的沉痛自诉: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老成丑。

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这样的展示个人不堪的书写,与那个书写着时代史诗的诗人同为一入。杜甫的伟大不只是由那些书写时代画卷的伟大诗篇所成就,也由这样的个人书写所成就。

如果说杜甫的《三吏》、《三别》及其《兵车行》、《哀江头》、《春望》构成了对社会与时代的批判,那么杜甫个人自诉的诗歌则构成了深深的自我省思。这是一个受难的儒者和充满罪疚感的诗人形象。二者体现了杜甫道德精神的内外两个层面。

统治阶级向来只愿意把诗人视为他们的清客或帮闲文人,视为权力的一种点缀,难以容忍诗人和诗歌成为民众的声音,成为兴观群怨的率直表达。否则,诗人就会失去权力的庇护,陷于饥寒冻馁之命运,甚或遭遇迫害与放逐。杜甫的悲剧性伟大在于,尽管他能够洞悉这一切,他也不曾采取任何一种方式的逃避。对国运之不幸的关心,对处于离乱灾变之中民众的深切同情,构成了杜甫个人生涯与诗歌的核心内容。生活在一个繁华被毁灭的时代,杜甫的一生是沉重的甚至是悲惨的,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杜甫就已洞察到盛世之下社会内部的重重危机。当战火燃起,无限繁华化为灰烬,他亲历了灾变,但却无力缓解它;后来,他的归路被战火阻隔,最终在无尽的漂泊中客死异乡。是的,诗歌不能阻止权力、暴力与野心对生命的伤害,但却能够为一个民族铸造出一颗良心。

一个时代总是把它最深刻的印记打在那些身处边缘的人物身上。杜甫不仅见证了时代,它的动荡、毁灭、灾难与整个社会的苦难,也见证了在这一世界里一个诗人的屈辱与自我拯救。在这里,时代与个人、历史与诗歌之间的张力得到了高度的体现。作者对这些屈辱生涯的摹写没有使杜甫失去其伟大与光辉,相反,作者笔下的杜甫彰显了另一种新型的人格,那不是虚幻的诗人的高蹈与逃逸,不是幻想中的自我神化与仙化,而是严酷现实中真实的个人境遇。杜甫就是这样一个人,将自身的屈辱与失败转化为一种道德感知的源泉,凝练为一个饱受创伤的社会与民族的良知的最终表达。

事实上,杜甫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过着一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寒酸生活。在这样一个毁灭性

的时代里,杜甫虽然饱受创伤与屈辱,却并没有被毁灭。“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面对毁灭性的社会动荡,面对着权力的腐败与社会道德感受力的溃败,在一个毁灭诗歌的时代,饥饿与贫病的杜甫仍然在以诗歌的形式馈赠着世界,而且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杜甫由于仕进的失败而认识了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疾病而切身感受到众生的苦痛。这正是杜甫生涯与诗歌所具有的神圣性——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置身世外的单纯的观察者,时代的一切苦难与不幸杜甫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在灾荒年月,杜甫的身影出现在从太仓领米的饥民队列里;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中,我们看见大唐最伟大的诗人混杂在流亡的人群里,他不幸又天命般地分担着一切流亡者、一切无家可归者应有的命运。这种生活伴随着杜甫的一生,直至其晚年,他依然在据实写着他的“逃难”生涯:“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在杜甫的生涯及诗歌中,可以体悟他对“吾道”的执著,除了《空囊》诗中的“世人共鲁莽,吾道属艰难”的感慨,还有诸如《秦州杂诗》中的“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的疑虑,《积草岭》中“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述怀》中“浮生有荡汨,吾道正羁束”的叹息,《屏迹三首》中“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的发明,《发秦州》诗中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的彰显。“吾道”是杜甫思想的核心。他的“吾道”是社会的“男谷女丝行复歌”,是他所期盼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即使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也“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但杜甫坎坷一生,其社会伦理与政治理想或“吾道”成为一道幻影。然而,这种失败感转而成为他诗歌写作的另一种不可磨灭的“吾道”,只有他的诗歌承载了“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的寄托,而不至于在无道的乱离之世道毁灭人灭。

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用诗篇凝聚了一个时代的良知,从寄希望于明君改造社会到以诗人良知的自觉,从被动地承担社会苦难到自觉其

受难所具有的社会伦理意义,《诗圣杜甫》最终通过杜甫生涯的描写锻造出一个时代的良心,并通过其诗歌语言将其呈现。就此而言,《诗圣杜甫》不仅通过一个诗人的生涯展现出一个时代的苦难,而且呈现出一个诗人和其诗歌写作之于一种时代苦难的道德意义与诗学意蕴。可以说,作家所着力塑造的并不是诗人所承受的苦难,而是一个诗人经过他的诗歌写作之道怎样超越了那个毁灭了他的时代,一个被毁灭的人如何成就自我。就此而言,杜甫也许是个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个人遭际与“吾道”共命运,他的诗歌写作则与“吾道”共存。这或许正是韬光先生对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回答。

《诗圣杜甫》最感人之处恰恰在于杜甫从充满不幸、苦难与失败感的生涯中通过诗歌使个人获得了新的生命支点:“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由此,杜甫从一个充满毁灭的时代中拯救了自己,也是对一个时代的道德救赎,这一切不是通过科举成功,不是通过仕途抱负,而恰恰是通过那个时代所忽略的方式,即通过诗歌和语言的救赎。杜甫不仅由此奠定了自身诗圣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诗歌本身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在正统的“道”日渐隐晦式微之时以蕴涵着个人情感的诗歌写作激发了悠悠“吾道”。

作为“大唐诗人三部曲”的第二部,“诗圣杜甫”的形象与李白构成了醒目的反差。如果说《太白醉剑》接近或突出了李白生涯的传奇性的话,《诗圣杜甫》则还原历史般地呈现了杜甫的生涯及其所置身其中的广阔社会图景,具有杜甫诗歌本身所见证的史诗性。如果说韬光先生所塑造的李白及其诗歌历程是一部个人情感的传奇,那么他所书写的杜甫就是一部道德受难的社会史诗。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歌修辞功力,或者格律用得好,更重要的是他那种以个人微弱之躯承担社会伦理责任、拒不回避现实苦难的人格精神,更在于他将这样一种人格精神融入到诗歌自身的传统之中。掩卷之时,留在我们心中的是一代诗圣对人世的那些无尽的感叹:“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

今朝更被除”；“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他对自身的身世有着纷繁的诗歌形象的自喻，“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鸥”……如今韬光先生则通过这部小说再现了这一感人肺腑的因受难而显得伟大的形象。《诗圣杜甫》所表达的或许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次罕见的“道成肉身”。杜甫还曾感叹他“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今千载之下，但愿通过韬光先生独具文学魅力的《诗圣杜甫》，有更多的读者成为杜诗的知音。

在为韬光先生祝贺的同时，我也由衷地为广大喜欢和热爱唐诗的读者感到喜悦。毕竟，千年以降，以洋洋两百万浅近文言来描述代表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象征的“诗仙”、“诗圣”、“诗魔”的文学作品是罕见的，它不仅需要作家有丰厚的生活阅历，更要求作家至少是一个唐诗和唐史的专家，实非大家不能为也！韬光先生所成功创作的“大唐诗人三部曲”之《太白醉剑》、《诗圣杜甫》、《长安居易》，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和厚爱。

2010年3月30日

目 录

序一：文学解读的魅力	王立群	/	1
序二：毁灭、见证与救赎	耿占春	/	1

目
录

楔 子		/	1
第 一 章	降瑞雪杜甫莅世 仰先贤少年立志	/	3
第 二 章	豪情诗诵千里马 崔十意激壮士心	/	18
第 三 章	意兴舒喉岐王府 诗才挥洒翰墨场	/	27
第 四 章	杜子美嵩山探幽 旻上人江宁画鹰	/	44
第 五 章	大明寺鉴真说教 吴越地古迹觅诗	/	62
第 六 章	辞吴越东都应试 游齐赵邯郸怀古	/	75
第 七 章	聚兖州诸子倾心 登城楼子美放歌	/	90
第 八 章	岱宗望岳众山小 日月相曜洛阳城	/	102
第 九 章	酣酒狂歌客梁园 呼鹰逐兽齐赵间	/	113
第 十 章	众星共曜睢阳地 仙圣同觅华盖君	/	125
第十一章	群儒放诗历下亭 两曜辞别石门路	/	134
第十二章	子美寄身长安城 太白荐书汝阳王	/	150
第十三章	八仙醉歌惊四座 求其友声访郑虔	/	164
第十四章	奉天探父乾陵行 长安兴狱士子惊	/	181
第 十 五 章	郑虔闲话李北海 岑参探访杜子美	/	189